

• 土耳其史研究 •

西化催生的新芽：奥斯曼帝国 晚期的妇女教育

王三义* 张文婷**

内容提要 奥斯曼帝国晚期的西化改革为妇女教育的兴起带来诸多促进因素。随着报纸、杂志、书籍、电报等的引入，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文学作品和媒体为妇女教育发声，尤其强调妇女教育的权利不可被剥夺。政府颁布公共教育法，此后女子学校陆续建立，妇女教育也得到家庭支持。尽管帝国晚期的妇女教育还受到多方面条件的限制，普及程度不能高估，但妇女教育的兴起，毕竟打破了传统奥斯曼社会对妇女教育的偏见，也促进了奥斯曼帝国社会风气的转变，对妇女的婚姻家庭观念、就业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妇女教育的兴起也反映出奥斯曼帝国晚期西化改革取得的成绩。从长时段来看，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妇女教育是中东地区历史上妇女进步和解放的起点。

关键词 奥斯曼帝国 西化改革 妇女教育

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以穆斯林为主体，而伊斯兰传统社会对妇女教育存在偏见甚至歧视，这在广为流传的谚语和古老的迷信中可以反映出来，比如，说“妇女头发冗长见识短浅”，相信“学习写字诱导妇女成为女巫”。对于教育妇女识文断字，社会舆论也持反对态度，认为妇女一旦具备了读写能力，便会写情书追求男子，不利于保持贞洁。^① 久而久之，接受教育成

* 王三义，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 张文婷，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① Fanny Davis, *The Ottoman Lady: A Social History from 1718 to 1918*,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p. 49.

为男子的特权，妇女被排斥在受教育的对象之外，而传统奥斯曼社会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正常。其实《古兰经》并没有禁止妇女受教育，在奥斯曼帝国的上流社会尤其在宫廷，妇女接受教育并不罕见。问题在于，作为普通民众的妇女阶层，在西化改革之前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女子们所受的家庭教育，主要强调宗教信仰、道德，以及婚姻家庭理念中的如何服从。^① 因此，土耳其史中一个基本判断是：土耳其妇女在凯末尔时代得到解放，包括妇女教育的发展。也就是说，从妇女教育史的角度看，奥斯曼帝国瓦解及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是一个“分水岭”，实际情况未必如此。

国内研究奥斯曼帝国改革时期妇女教育的论文并不多见。学者们在研究土耳其妇女问题时，已经追溯到了帝国的改革时期。学界普遍认为奥斯曼帝国妇女开始觉醒于西化改革时期。范若兰指出，西化改革时期存在部分妇女受到教育的现象，但广大的妇女群体并未得到解放。^② 张明华认为，帝国晚期时的妇女教育局限于精英阶层，凯末尔改革是改变妇女教育状况的“分水岭”。^③ 实际上，妇女的觉醒可以回溯到坦齐麦特改革时期，妇女教育与妇女地位、女权运动、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息息相关。帝国晚期的妇女教育也零星散见于土耳其女权运动发展的研究中。在研究帝国的女权运动时，任颖指出帝国晚期时女权主义者已经认识到教育对于妇女进步的重要性。^④ 在考察帝国的女权思潮时，周昭华认为其传播开始于坦齐麦特改革时代。对于妇女来说，坦齐麦特改革突出的成就是在教育方面。^⑤ 从 1839 年坦齐麦特改革之后直到帝国的瓦解，这段时期内妇女教育有没有兴起？发展的程度如何？妇女教育与西化改革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妇女教育对于广大妇女群体的社会生活又有着什么作用？很有探究的必要。

① Ruhi Özcan, "Ottoman Family and Child Education (1300-1600),"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174, 2015, pp. 1607-1608.

② 范若兰 《土耳其妇女地位初探》，《西亚非洲》1989 年第 2 期，第 69~73 页。

③ 张明华 《凯末尔时期土耳其妇女解放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17，第 17~24 页。

④ 任颖 《探析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女权运动的嬗变》，《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第 102~106 页。

⑤ 周昭华 《土耳其女权思潮与实践的历史考察》，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08，第 6~12 页。

一 西化改革——妇女教育兴起的条件

从现有的史料看，奥斯曼帝国真正意义上为女性争取受教育的权利是在“坦齐麦特”时期。当时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上层阶级受过教育的女性作家主张妇女获得教育，获得解放。随着西化改革的推进，生活在大城市的妇女得以接触更多的西方思想，为女子建立学校的社会需求逐渐增加。

奥斯曼帝国晚期经济衰落、政治失稳、外敌入侵，危机中被迫实行西化改革。西化改革的努力，促使西方因素逐渐渗入奥斯曼社会。首先，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改变，为妇女教育的兴起准备了良好的物质环境。从坦齐麦特改革到第二次宪政时期，奥斯曼帝国的对外贸易、交通运输事业、通信媒体技术取得了进步，这就为奥斯曼社会风气的西化、妇女生活环境的进步准备了物质技术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臣民与来访或定居的欧洲人接触增加，帝国臣民到欧洲学习、经商的活动增加，他们得以了解和学习欧洲人的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以伊斯坦布尔这样的港口城市为例，从颁布“古尔汗法令”到1908年土耳其革命，改革者起草了三份城市规划，并且聘请了外国的工程师和建筑师。城市规划的实施和公共场所的开放，使得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空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如，引进汽船和电车，使得公共交通更加便捷，新的交通方式也缩短了人们到公共场所（如长廊和公园）的时间，缩短了男女之间的社交距离。改革时期引入了报刊、书籍、电报等印刷媒体和通信技术。^① 知识分子阶层借助物质技术手段传播西方思想和讨论妇女问题。西化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环境出现西化倾向，社会风气的变化为妇女地位、妇女教育等问题的讨论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西化改革时期，帝国以商品为媒介与西方经济互动塑造了帝国的社会经济新面貌，同时，政府在教育方面进行了改革，实际的变化具体来看有三点：第一，随着帝国与欧洲贸易交往进一步发展，帝国的官员逐渐获得

^① Nihan Altınbaş, "Marriage and Divorc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Social Upheaval, Women's Rights, and the Need for New Family Law,"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Vol. 39, No. 2, 2014, pp. 114–125.

文化资本、少数民族商人积累了商业资本。^① 第二，帝国在教育领域推行了改革，新建的军事学校和医学院传播了西方的科技知识和文化，这更新了奥斯曼帝国精英阶层的思想观念。19 世纪中叶，一些官僚以及在欧洲接受教育的年轻思想家，已经开始讨论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新思想，其中就包括自由、平等、教育和妇女公民权的概念。^② 第三，西化改革还将西方文明的概念引入奥斯曼社会，出现了西式学校，以及各类社会组织、秘密团体、阅览室、沙龙、图书馆等。西方文学如小说、短篇故事，西方报纸等印刷品引入奥斯曼社会。文学作品带来了西方思想和社会话题，如“新的个人观”“自由观”“妇女权利”“社会公平”“海外教育”“欧洲时尚”等。从官方来看，18 世纪时帝国大使馆引入新的西方词汇来描述欧洲社会的景象。在民间，19 世纪时奥斯曼帝国臣民始使用法语词语，比如“自由”“平等”。^③ 文化环境呈现西化倾向，奥斯曼社会出现了新的重要群体——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借助文学作品向社会宣传妇女教育、妇女进步思想，他们在促进妇女教育与进步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方文化思想的传入，更新了奥斯曼帝国男性知识分子的教育观念。一些受过教育的男性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妇女受教育对于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性，他们思想开化，推崇西式教育。自 19 世纪下半叶，随着西化的步伐加快，在像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大城市已经可以聘请外国人做家庭教师。进步和富裕家庭的少数上层阶级女性，受益于父亲和丈夫的特权，获得了受教育机会。例如，活跃在印刷和公共生活中的小说家法特玛·阿里耶（Fatma Aliye），是著名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艾哈迈德·杰夫德特帕夏（Ahmet Cevdet Pasha）的女儿；精通八门外语的诗人尼加尔·哈纳姆（Nigar Hanım），是马扎尔·奥斯曼帕夏（Macar Osman Pasha）的女儿；著名小说家和活动家哈立德·埃迪布（Halide Edib），是哈密德二世的书记官埃迪布·贝伊（Edib Bey）的女儿，也是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萨利赫·泽基（Salih Zeki）

① Fatma Müge Göçek, *Rise of the Bourgeoisie, Demise of Empire: Ottoman Western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1.

② Altınöz Vuslat Devrim, *The Ottoman Women's Movement: Women's Press, Journals,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from 1875 to 1923*, MA. Diss, Miami University, 2003, p. 2.

③ Fatma Müge Göçek, *Rise of the Bourgeoisie, Demise of Empi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17–129.

的妻子；女权主义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内齐赫·穆希丁（Nezihe Muhittin）来自官僚家庭。^①以上层阶级为代表的妇女得到西式教育的润泽，这些知识女性又对奥斯曼帝国的妇女教育进行反哺。杰出女性的作品乃至她们自身的经历都是对妇女教育最好的宣传。

宣传妇女教育需要物质载体，印刷业的发展为进步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女性提供了发声的平台。西化改革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社会上文化日益繁荣，文明载体逐渐增多，报纸、杂志、图书等各种印刷品增加了不少。^②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通过文学作品为妇女和妇女教育发声。青年奥斯曼党的杰出代表和先进的知识分子代表开始宣传妇女教育。萨米是奥斯曼帝国早期倡导穆斯林妇女权利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著名的小说家、戏剧家。通过文学作品，萨米传递出以下关于妇女教育的理念。首先，妇女的智力水平与男性本质上相等，其受教育的权利不应该被剥夺。其次，妇女教育应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妇女教育的内容也应包含广泛的科学、艺术课程。妇女教育是文明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妇女接受教育有利于构建理想婚姻模式，有利于妇女提升自己，获得工作机会。萨米的一位挚友纳米克·凯末尔（Namık Kemal）在1867年创作了《妇女教育备忘录》，明确指出帝国的发展与教育妇女息息相关，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③同一时期，另一位较有影响力的女性问题作家是埃及的卡西姆·阿门（1865～1908）。她在《解放妇女运动》和《新女性》中，宣称只有妇女受到教育，她们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④

在印刷业中，妇女期刊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根据瓦斯拉特·德夫里姆·欧提努斯（Vuslat Devrim Altınöz）的统计：在1919年以前，至少有40种女性期刊得以出版发行。这些期刊除了关注妇女在家庭中的责任，还强调了要消除男性对女性智慧的偏见，呼吁妇女应获得受教育权利、婚姻权

① Derya Iner, "Gaining a Public Voice: Ottoman Women's Struggle to Survive in the Print Life of Early Twentieth-century Ottoman Society, and the Example of Halide Edib (1884 - 1964)," *Women's History Review*, Vol. 24, No. 6, 2015, p. 974.

② 王三义《帝国之衰：奥斯曼帝国史六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203～205页。

③ George W. Gawrych, "Şemseddin Sami, Women, and Social Conscienc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6, No. 1, 2010, pp. 97 - 102.

④ Fanny Davis, *The Ottoman Lady: A Social History from 1718 to 1918*,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p. 50.

利等。1868 年, 杂志《进步》(*Terakki*) 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三女士”的文章, 分析了妇女遭到歧视的原因是屈从于男性, 而根本原因是男性不允许妇女接受教育。1888 年, 一份名为《妇女进步》的报纸发行, 关注西方妇女运动, 宣传女权主义, 提出妇女应接受高等教育, 应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在就业和婚姻方面有平等的权利。1895 年, 另一份在女性出版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报纸——《妇女专报》(*Hanımlara Mahsus Gazete*) 开始发行。该报纸第一期就明确指出了妇女教育对于培养下一代的重要意义, 以传播妇女教育为宗旨。1908 年, 《妇女》(*Kadın*) 杂志开始发行, 并指出在教育领域已经发生了积极的改变, 其他领域也为妇女打开了大门。^① 帝国晚期发展迅速的印刷业对于妇女有特殊意义, 它为有文化知识的妇女开辟了写作空间, 培养和宣传了知识女性代表, 同时在教育妇女和组织妇女方面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妇女作家从舆论上对妇女教育进行启蒙和开导, 把追求女子教育作为解决妇女问题的突破口, 积极地进行探索促进妇女进步的途径, 奠定了妇女教育发展的基石。

二 从官方到民间——妇女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

根据 1869 年帝国颁布的《教育法令》, 可将奥斯曼帝国的教育划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政府监督控制的官方教育; 另一类是由奥斯曼个人、宗教团体或者外国公民创办但受到国家控制的民间教育。^② 本文对于妇女教育的状况也采取了同样的分类讨论方法。

坦齐麦特时期, 政府已经认识到向妇女开放正规教育的必要性。从 1842 年开始, 政府陆续开办了从小学到高中不同层次的学校, 其中一些学校也招收女学生。1856 年, 政府还颁布了《改革法令》, 法令强调学校对所有的臣民开放, 无论性别和政治角色, 唯一的限制是由教育部控制课程和教师。1858 年, 伊斯坦布尔建立了一所女子中学 (*Kız Rüştıyesi*), 学校的

① Altınöz Vuslat Devrim, *The Ottoman Women's Movement: Women's Press, Journals,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from 1875 to 1923*, MA. Diss, Miami University, 2003, pp. 7-17.

② Emine Ö. Evered, *Empire and Education under the Ottomans: Politics, Reform and Resistance from the Tanzimat to the Young Turks*, London: I. B. Tauris, 2012, p. 206.

教师都是由德高望重的男性担任。^① 1869 年，奥斯曼帝国政府颁布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公共教育法，在奥斯曼教育现代化进程、妇女教育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869 年 9 月 1 日政府颁布了《公共教育条例》，条例包含了建立女子小学、中学、师范学院的规定。

首先是小学教育。所有奥斯曼帝国的儿童都要接受四年小学义务教育。小学教育（Sıbyan）要求女生的入学年龄是 6~10 岁，男生的入学年龄是 7~11 岁，学制为四年制。如果一个地区或村庄存在两所小学的话，这两所学校将分别指定给男生和女生。女子小学的教师和缝纫指导必须是女性，在缺乏合格的女性教师之前，都是用德高望重的男性教师代替。对于非穆斯林儿童的教育内容为伊斯兰教的宗教知识，其教师也是由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指定的。^② 为穆斯林儿童安排的法定课程包括奥斯曼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历史、地理、数学、音乐、绘画以及其他实践技能。这些公立学校还给主管、教师、仆人提供了一定的薪资。尽管一些科目缺少合格教师，公立学校的女孩们也得到了良好的教育。1870 年，有 32 名女孩通过了教育部长和其他官员的考试，这些考试包括语法、算术、地理、拼写、书法、绘画、制衣。^③

其次，女子中学的建立被提上日程。女子中学的学制也是四年制。在大城市有专门为穆斯林学生建立的女子中学，也有专门为基督徒学生建立的女子中学。宗教混合的居民社区要有 500 户人家才满足建立女子中学的条件。非穆斯林女学生不需要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语法，而是学习她们自己的语言。穆斯林女孩要学习宗教科学导论、奥斯曼语法导论、阿拉伯语、波斯语语法、正字法、作文、文学选读、家庭经济、简明历史、地理、算术和管账、绘画、刺绣、缝纫、音乐。女子中学配备 2~4 名女性教师，还有专门的缝纫和音乐教师以及门卫。教育部每年的基金拨款最大额度为 4 万库鲁什。凭借女子小学的文凭，可以直接进入女子中学而不需要考试。^④

① Altinöz Vuslat Devrim, *The Ottoman Women's Movement: Women's Press, Journals,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from 1875 to 1923*, MA. Diss, Miami University, 2003, pp. 23–24.

② Emine Ö. Evered, *Empire and Education under the Ottomans: Politics, Reform and Resistance from the Tanzimat to the Young Turks*, London: I. B. Tauris, 2012, pp. 207–208.

③ Fanny Davis, *The Ottoman Lady: A Social History from 1718 to 1918*,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p. 51.

④ Emine Ö. Evered, *Empire and Education under the Ottomans: Politics, Reform and Resistance from the Tanzimat to the Young Turks*, London: I. B. Tauris, 2012, pp. 212–213.

为了给小学和中学培养女性教师，建立女子师范学院是很有必要的。学院设立的两大部门分别为小学和中学培养教师，每个部门又区分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女性。小学部的学制为两年，课程为算术和管账、奥斯曼历史和地理、实用知识、音乐、缝纫和刺绣练习。中学部的学制是三年制，课程为：奥斯曼语法和写作、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伦理、家庭经济、历史和地理、数学与自然科学导论、绘画、音乐、多种形式的裁剪训练课。小学部和中学部对于非穆斯林女学生教育都是根据她们自己的宗教习惯设置的，教学采用各自民族语言、基于自己宗教科学的课程，有专门的教师。学院配备有一位女性主管和足够数量的教师负责人文和科学教程，刺绣专家和两名女仆。当缺少女性教师时，德高望重的男教师也是可以接受的。主管的工资是每月 1500 库鲁什，教师和专家是每月 750 库鲁什，女仆是每月 150 库鲁什。有女子小学和中学文凭的学生无须考试可以进入女子师范学院学习。女子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必须接受她们的教学任务，她们也受到官方学校的青睐。^①

1870 年建立的培养女性教师的学院，最初只有在缝纫和刺绣的课程上聘请了女性教员，其余课程都是男性教员负责。很多毕业的女性最后选择留校任教，以至于女性教员的数量一度超过了男性。1872 年，女性可以成为教师。^② 女子师范学院 (Darülmüallimat) 为女子中学教育培养了足够的教职人员，各省份的女子中学数量增加。1874 年，在伊斯坦布尔及郊区建立的 9 所中学，在之后的四年时间里一共招收学生 248 名。1901 年建立的 11 所女子中学，拥有教师 40 人，一共招生 1640 名。这些数字显示，进入中学的女孩人数逐渐增加，表明了人们越来越接受妇女教育的观念。青年土耳其党时期，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得到了进一步扩大。1911 年，中学 (idadiye) 对妇女开放。1913 年苏丹尼耶 (Sultaniye) 的公立中学为女孩增加了体育教师。1914 年 2 月，伊斯坦布尔大学为妇女开设了特别课程，招收了 250 名学生。同年政府还将 26 名土耳其女孩派往欧洲的学校接受教育，其中一些女孩被派往瑞士学习绘画和教育技术。伊斯坦布尔大学教授的课程包括

① Emine Ö. Evered, *Empire and Education under the Ottomans: Politics, Reform and Resistance from the Tanzimat to the Young Turks*, London: I. B. Tauris, pp. 221 – 223.

② Meryem Karabekmez, “A Case Study of Women Instructors and Their Education in the Reign of Abdülhamid II,” *Paedagogica Historica*, Vol. 46, No. 1 – 2, 2017, pp. 73 – 74.

卫生、科学、女性的权利和义务。到了 1919 年，妇女在获取学位和授课地点选择上获得了平等。^① 在青年土耳其党时期，不只是妇女教育问题受到了统治者的关注，妇女地位的讨论也出现在国家议程中。青年土耳其党人认为妇女教育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利益和人民福祉，应将妇女教育作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例如，格卡尔普（Gökalp）认为由于妇女是家庭的基石，受过教育的妇女将惠及她的家庭，家庭越强大，国家就越强大。同时，他认为妇女地位的低下与宗教有关，而这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解决，因此，奥斯曼帝国的妇女绝对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恩维尔（Enver）和杰马尔帕夏（Cemal Paşa）支持传教士的教育活动，也赞成为穆斯林妇女建立学校。^②

政府对妇女教育的推动，也得到民间个人和团体对妇女教育的关注和支持。其中，私人教育观念得到了改变，这一现象集中发生社会地位高而且富裕的家庭。来自上层阶级家庭的女儿们受益于思想开化的男性家长。比如前文提到的女小说家法特玛·阿里耶，由于她的父亲是艾哈迈德·杰夫德特帕夏，她童年时期得到了家庭教师和父亲的启蒙教育。在青年时期，父亲通过与女儿特殊的谈话教育，在历史、哲学、宗教和逻辑等许多领域影响了法特玛·阿里耶。^③ 另一位杰出妇女埃米内·福特·图嘉怡（Emine Foat Tugay），因其祖父阿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夏（Gazi Ahmet Muhtar Paşa）是 1877 ~ 1878 年的俄土战争的英雄。她的家庭传记展示了奥斯曼帝国上流社会的教育模式——人们非常重视学习正确的外语发音，家庭聘请的欧洲老师都是以他们所学语言（德语、法语和英语）为母语。她们还学习土耳其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语法，伊斯兰教和土耳其历史，甚至书法。“坦齐麦特”时期的教育部长萨菲特帕夏（Saffet Paşa）为女儿赛尼耶·杰纳尼（Seniye Cenani）安排了法语老师、土耳其语老师和钢琴老师。苏菲帕夏（Suphi Paşa）曾为促进妇女的官方教育做出很大贡献，他的女儿们几乎全部接受过私人教育和外国家庭教师的教育。另一位土耳其历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小说家

① Fanny Davis, *The Ottoman Lady: A Social History from 1718 to 1918*,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pp. 52 – 56.

② Nihan Altınbaş, *Marriage and Divorce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Ottoman Society: The Law of Family Rights of 1917*, Ph. D. Diss, İhsan Doğramacı Bilkent University, 2014, pp. 71 – 72.

③ Cevdet Kırpık, “Fatma Aliye Hanım and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of the Turkish World*, Vol. 53, 2010, p. 141.

哈立德·埃迪布·阿德瓦尔 (Halide Edib Adlvar , 1884 – 1964) 的父亲埃迪布·贝伊 (Edib Bey) 是阿卜杜·哈密德二世的秘书。出于崇尚英式教育方式, 哈立德的家庭选择让她在家中接受外国教师的培养。^①

此外, 在奥斯曼臣民的支持下, 妇女的职业技术教育也得到了发展。1877 年, 第一所女子工艺美术学校成立, 1878 年奥斯曼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阿赫迈特·沃菲克 (Ahmet Vefik) 为了使妇女可以自立生活, 在于斯屈达尔 Üsküdar 开办了一所三年制的学校。1881 年, 第二次担任教育部长的苏菲帕夏 (Suphi Paşa) 将这所学校变成了第二个女子工艺美术学校。1879 年, 在托普卡帕宫附近又增加了第三所工艺美术学校。这是一所寄宿学校, 学校建立的初衷是为女童提供学习技能和知识的平台。从最初的一个月只招收 5 名学生, 到 5 年后拥有 75 名寄宿生和 125 名走读生, 寄宿制的出现是妇女教育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进步。^②

外国传教士或者宗教团体、慈善组织, 以及少数民族自己的宗教团体也为推动少数民族的妇女教育做出了贡献。这里以犹太妇女和希腊妇女获得教育的情况为例。犹太妇女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与传教和外国慈善组织的努力是分不开的。19 世纪 30 年代末, 当奥斯曼帝国开始出现官方妇女教育时, 由于语言和宗教障碍, 官方教育对犹太妇女的影响有限。这一时期传教活动正在增加, 传教士致力于女孩的教育, 包括犹太女孩的教育。传教士建立的教会学校免除学费的同时, 还会提供食物、衣服等。由于帝国许多地区贫困状况日益加剧, 当地犹太人选择传教士建立的学校。多数女子学校会为妇女提供以针线活为主的职业培训, 从而使她们有机会获得有薪酬的工作。影响奥斯曼帝国犹太妇女教育的西方国家以法国、德国、意大利三个国家为主。1854 年, 一所法国人支持的犹太学校在耶路撒冷建立 (至今这所学校仍然存在)。19 世纪 60 年代, 犹太教育和慈善组织 “以色列大学联盟” (简称 AIU^③) 在帝国各地兴起, 在犹太女性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以色列大学联盟” 在帝国建立了 45 所女子学校, 包括职业学校和

① Fanny Davis , *The Ottoman Lady: A Social History from 1718 to 1918* ,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1986 , pp. 48 – 55.

② Fanny Davis , *The Ottoman Lady: A Social History from 1718 to 1918* ,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1986 , p. 52.

③ 全称 “Alliance Israelite Universelle”。

男女混合学校。这些学校中有许多位于安纳托利亚，但逐渐地犹太人集中的城市大多数有了自己的“以色列大学联盟”女子学校。德国犹太教育和慈善组织（简称 HV）^① 强调德语和德国文化。1904 年这个教育和慈善组织在巴勒斯坦开始运作，并资助建立了一些男女同校的学校和幼儿园。该组织的一项重要贡献是在巴勒斯坦为女幼师设立了教师培训学校。意大利的犹太女性教育工作仅限于利比亚（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的黎波里的犹太商人希望意大利犹太人帮助发展现代教育，这些要求恰好与意大利殖民利比亚的政治计划吻合。在意大利建立的女子学校中，很多当地的犹太妇女被培养成教师。^② 尽管西方国家的初衷是为了推行西方文化，但还是推动了奥斯曼帝国犹太妇女教育事业的发展。

少数民族女性教育中希腊的妇女教育具有代表性。19 世纪欧洲和奥斯曼帝国发生的社会变革，使人们认识到女性在养育和教育下一代方面的重要性，以及为学校培训教师日益增长的必要性。希腊社区内女孩受教育的状况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安纳托利亚和伊斯坦布尔开设了小学、中学和高中级别的女子学校。1869 年帝国政府颁布的《公共教育条例》，对于希腊人的教育放宽了课程、教科书、教师的要求。第一所女子学校建立在帕拉达（Palada，1874 年建），第二所女子学校建立在萨皮恩（Zapyon，1875 年建）。女子学校的经费由基金会、社区收入、教会收入和私人捐款提供。希腊的女子学校有三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教学语言上包含外语语言教育；教学内容提供希腊文化背景和艺术课程；教学方法采用了现代欧洲教育方法。^③ 从形式、内容、方法上来看，希腊妇女接受的西化教育程度较高。

总体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对妇女接受公共教育的一切法律限制都已取消，而时代遗留的对个人的严格限制仍然存在。从坦齐麦特时代开始，关于妇女世俗的、西方式的教育模式的需求增大，观念得以传播，以上流社会的女性的私人家庭教育和中产阶级的官方教育为代表，妇

① 全称“Hilfsverein der deutschen Juden”。

② Rachel Simon, “Between Two Worlds: Education and Acculturation of Ottoman Jewish Women,” in Duygu Köksal, and Anastasia Falierou eds., *A Social History of Late Ottoman Women: New Perspectives*, Leiden: Brill, 2013, pp. 116–120.

③ Macar, Oya Dağlar, “Ottoman Greek Education System and Greek Girls’ Schools in Istanbul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Education Sciences: Theory and Practice*, Vol. 10, No. 2, 2010, pp. 806–812.

女教育伴随着西方风气在国家的催动下开始萌生。

三 成就与局限——对妇女教育发展的评价

妇女接受教育和妇女地位改善本身就是土耳其现代化过程和妇女进步与解放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客观认识帝国晚期妇女教育的意义是很有必要的。

其一，从社会价值看，妇女教育促进了奥斯曼社会风气的转变，一部分进步妇女开始进入社会空间，冲击着传统的社会格局。例如妇女参与组织团体，出版刊物，呼吁对女性进行启蒙教育，批判传统的婚姻模式，追求时尚潮流，参与爱国主义的宣传和慈善活动。教育和改革也极大地改变了妇女的公共形象，部分女性追求身体解放。比如，一些受过教育的上层女性开始抛弃面纱，或者使用很薄的面纱。1922 年，一些土耳其妇女在参加美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上放弃佩戴面纱。^① 尽管这样的情况并不普遍，但这样的出格行为足以引发社会的关注。根据《土耳其妇女》杂志的报道，在帝国晚期的伊斯坦布尔大街上，妇女们甚至在午夜漫步。一些妇女从有轨电车上跳下来，大声说话，这些行为冲击着社会上保守的男性和女性。

教育也影响了妇女的家庭婚姻观念和就业意识。随着妇女协会的增多，大学向妇女开放。在战争因素的刺激下，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了劳动大军。以伊斯坦布尔为例，在学校、银行、邮局以及剧院里，出现了男性和女性一起工作和社交。进步的知识女性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宣传工作对于妇女摆脱困境和虐待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社会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对家庭生活、婚姻和离婚的观念有所改变，特别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富足、渴望参与社会生活的人。开明的知识分子和精英以及妇女作家的生活方式和习惯随着改革而逐渐改变，他们对婚姻家庭模式的选择更倾向于核心家庭。一些进步的妇女已经认识到共同的品味、社会背景，甚至思想是成就美满婚姻的条件。^② 妇女教育的兴起，冲击了传统社会的妇女教育观，唤醒

① Nermin Abadan-Unat: *Women in Turkish Society*, Leiden: Brill, 1981, p. 7.

② Nihan Altınbaş, "Marriage and Divorc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Social Upheaval, Women's Rights, and the Need for New Family Law,"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Vol. 39, No. 2, 2014, pp. 119 - 124.

了妇女的权利意识，拓展了妇女的视野范围，提高了认知水平，改善了妇女的生活条件，改变了她们的生活方式。妇女社会生活的变化自然也改变了社会风气。

其二，妇女教育兴起后，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女性代表。她们当中一部分妇女成了作家、音乐家、教师等，在不同的行业发挥自己的才干，参与并推动了土耳其现代化。例如，法特玛·阿里耶是土耳其历史上重要的女作家、翻译工作者，另一位著名女作家、小说家是哈立德·埃迪布·阿德瓦尔。她们二人都支持妇女教育，活跃在争取妇女权利的舞台上。西迪卡·哈努姆成为教师、音乐家、画家，并讲授《教育科学》和《教学原理》。1922 年有 24 名穆斯林女孩从美国女子大学毕业，其中 16 人成为教师，有 2 人成为医生，1 人成为律师，其他人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她们都成了有影响力的人物。^①

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前期，一些进步的知识妇女利用性别身份躲避哈米德政府的公开审查，借助自己的外语基础，传递信息。这在推动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宣传活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② 在巴尔干战争期间，诗人伊赫桑·拉伊夫（İhsan Raif）号召所有人奔赴前线为祖国荣誉而战，也表达了自己愿为祖国而牺牲的志向。法特玛·阿里耶曾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宣称妇女数量占国家人口的一半，国家的未来关乎妇女命运本身，号召妇女要保卫祖国而奉献。作家哈洁·艾米奈（Hace Emine）在报刊上呼吁妇女尽一切可能为祖国而战，哪怕仅仅是为战士缝制衣衫。^③ 教育赋予了妇女们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怀，她们在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中为祖国贡献了自己独特的力量。

其三，从时代意义上把妇女教育置于土耳其妇女解放的语境中考察，晚期帝国的妇女教育是土耳其妇女解放的起点和动力。教育是开启妇女解放的钥匙。关于土耳其的妇女解放和进步，人们往往将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看作“分水岭”，认为共和国时期凯末尔改革促成了妇女的解放。实际上，从坦齐

① Fanny Davis, *The Ottoman Lady: A Social History from 1718 to 1918*,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pp. 51–56.

② 王三义 《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1792–19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 267～268 页。

③ Ebru Boyar, “The Public Presence and Political Visibility of Ottoman Women,” in Ebru Boyar and Kte Fleet, eds., *Ottoman Women in Public Space*, Leiden: Brill, 2016, pp. 244–246.

麦特改革以来,随着西方因素的不断渗透,妇女接受教育和妇女进步问题已经出现在帝国的政治议程中,为凯末尔改革埋下了伏笔。成长于奥斯曼帝国晚期的进步妇女,她们在土耳其独立战争中的牺牲和贡献深刻地影响了凯末尔个人的观念。正如凯末尔演讲中提及的那样,妇女为民族独立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妇女占土耳其人口的一半,男性和女性应当共同分享生活,男性在科学、社会、经济、精神层面帮助女性。妇女是有自我意识、有知识的,她们有权获得自由、接受教育,和男子享受同样平等的社会地位。^①追溯土耳其妇女的整体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妇女地位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绝不是一蹴而就,社会对于女性问题的认识、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都是日积月累而形成的,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由妇女教育的发展奠定的。

不过,这一时期仍然是妇女教育的萌芽时期,在评价帝国晚期妇女教育状况时,不能高估妇女教育的普及程度。妇女教育的发展仍然受到许多条件限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主导教育的方向来看,妇女教育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国家政府和男性手中,男性反对的声音仍然是强烈的。例如,阿卜杜·阿齐兹的长子尤素福·伊泽丁(Yusuf Izzeddin)认为,让妇女接受和男性相同程度的教育是错误的,获得过多的聪明才智对于妇女是一种伤害,妇女的贞操和魅力才重要。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反对妇女在外国学校接受教育。在 19 世纪末担任教育部长的祖赫图帕夏(Zuhtu Paşa)虽然关心教育,但他并没有认识到为妇女提供高等教育的必要性。他的女儿受教育程度被限制在小学阶段。^②此外妇女获取知识的途径也是由男性掌握,他们的承担能力决定了是否为妇女阅读提供支持。

第二,从受教育群体来看,存在地域、阶层、民族的不平衡性。在穆斯林群体中,拥有特权的上层阶级的妇女获得教育的条件较为充分;在少数民族中,容易与西方国家取得联系的希腊人、犹太人更易接受外国学校的教育。从地理位置来看,受教育的妇女多集中在伊斯坦布尔、安纳托利亚这样的大城市中,这些城市由于地理位置便利,受西化改革影响较大,西化程度相对

① Mustafa Kemal Atatürk, *Atatürk'ün Söylev ve Demeçleri II*, Ankara: Atatürk Araştırma Merkezi, 2006, pp. 151–154.

② Fanny Davis, *The Ottoman Lady: A Social History from 1718 to 1918*,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pp. 49–55.

较深，生活变化比较明显。相反，偏远地区的妇女没有机会接受教育。

第三，严格的宗教限制依然存在。在性别隔离的社会中，妇女获得教育的机会被大大削弱。伊斯坦布尔大学对女性开放之初，学校不允许妇女和男性学生一起听课，也拒绝向妇女提供学位。在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的女子在男教师出现的场合必须戴面纱。青年土耳其党最初的想法是把受过教育的女子从伊斯坦布尔送到各省教书，但是穆斯林社会道德对女性的限制较严，有些愿望难以实现。^① 从数量和规模上来看，女子学校远不及男子学校。从学习环境上看，女学生在狭窄和黑暗的教室里接受教育，教室的窗户都装有铁条。从内容来看，课程完全是根据奥斯曼帝国对妇女的社会期望组织的，包括刺绣、手工艺品、家政、伦理和道德。^② 与男性教育相比，妇女教育发展滞后。

结 语

立足于女性视角，帝国晚期的妇女教育状况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帝国的改革成效。妇女教育的发展是伴随着其他社会层面的进步共同发生的，是奥斯曼帝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印证。奥斯曼帝国晚期对外贸易的发展、交通运输事业、通信媒体技术的进步，展示了物质文明的现代化。妇女教育事业既是现代物质文明的受益者，也是助力者。报纸、期刊为争取妇女教育权益提供了舆论支持。同时，妇女教育也提高了女性的识字率，培养了女性读者和作家。在文化环境层面，帝国晚期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家成立了许多文化教育机构，社会的受教育面得以扩大。帝国晚期的教育强调民族国家意识、现代化理念，有利于增强公民自豪感。青年土耳其党统治时期的教育政策表明，统治者相信妇女教育对国家的经济和普遍福祉有积极的贡献，因此他们把妇女教育提上政府议事日程。统治者还将民族主义与妇女教育联系起来，通过教育把妇女培养成合格的母亲，培养出具有民族主义情感的一代，从而推动国家的进步与发展。教科书中

① Fanny Davis, *The Ottoman Lady: A Social History from 1718 to 1918*,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p. 56.

② Altınöz Vuslat Devrim, *The Ottoman Women's Movement: Women's Press, Journals,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from 1875 to 1923*, MA. Diss, Miami University, 2003, p. 24.

明确指出了这种教育的意义所在：妇女最主要和最神圣的使命是教育儿童，并保证他们有良好的纪律性。历史课本中还告知女孩：作为奥斯曼帝国社会的“半边天”，妇女同样承担着民族主义的使命，更为重要的是，她们承担着为未来的孩子提供初级教育的任务。妇女教育是帝国教育普及事业的部分写照，也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妇女教育发展的局限性也从侧面体现了西化改革的难度。持续百年的西化改革，使得奥斯曼帝国社会的许多领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社会风气。帝国臣民的消费方式、生活习俗、文化教育、社会交往等，从表面上看具有现代气息。然而西化改革始终没有突破传统的伊斯兰教框架，也没有打破特权，未实现政治制度层面的实质性突破。妇女教育的资源和机会依然被垄断在权贵阶层手中，妇女前进的脚步依然受传统社会的妇女观、性别隔离制度的束缚。加上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发展的不平衡性，妇女教育在晚期帝国的社会变迁中面临的冲突和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奥斯曼帝国民族成分复杂，宗教信仰迥异，社会阶层多样，在接受西化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必然会出现差异。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地域、阶层、民族层面的不平衡性也反映在妇女教育的发展上。西化改革后，社会生活变化呈现明显的群体分布特征。从地域上来看，在大城市和交通发达的沿海城市，居民社会生活西化的程度高于偏远地区。从民族宗教来看，易于接受欧洲新事物的基督徒、犹太人的社会生活西化过程相对顺利。从社会阶层来看，有能力和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社会文明的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群体比一般民众的社会生活西化明显，正是这些社会群体，呼吁支持妇女教育。然而妇女教育方面的问题积弊太多，不是一小部分群体、一些改革法令就可以完全解决的。

概而言之，帝国晚期的妇女教育在兴起和发展时虽然面临许多阻碍和矛盾，毕竟冲破了传统奥斯曼帝国社会习俗对妇女教育的观念，给予一部分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妇女的自我意识得到提高，她们的就业观、家庭婚姻观甚至国家意识逐步形成。一些进步妇女参与推动了土耳其现代化的过程，为凯末尔时期的妇女解放奠定了基础，也开启了土耳其妇女走向进步和解放的历程。

[责任编辑：白胜洁]

The Study on the Worship of Egyptian God Thoth and its interactions with Greco- Roman Culture

Liu Jinhua

Abstract: Thoth is one of the oldest gods in the ancient Egyptian religious system. His worship has continued from the early day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to the Greco-Roman period. Originally being a god of the moon , Thoth soon has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as the protector and mediator in Osiris mythology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Horus and Seth , and the advocator and defender of the dead , and eventually he became the masters of all knowledge and magic in the world , even various types of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 such as literature , medicine , mathematics , etc. , were regarded as masterpieces of Thoth. During the Greco-Roman period , as facing the impact of foreign culture , the worship of Egyptian Thoth was not only continued , but also had mutual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with foreign religious cultures. The best example of this reciprocal effect is in the potenti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emotic Egyptian *Book of Thoth* and the Greek and Latin *Hermetica*.

Keywords: Ancient Egypt; Worship of Thoth; *Book of Thoth*; *Hermetica*

The Germination of Westernization: Women Education in Late Ottoman Empire

Wang Sanyi , Zhang Wenting

Abstract: The westernization reforms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brought many promoting factors to the rise in women's educatio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newspapers , magazines , books and telegrams , some enlightened intellectuals called for women's education through literary works and media , especially empha-

sizing that women's right of education cannot be deprived. The government promulgated an Education Act, and girls' schools were set up one after another, and women's education was supported by families. 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was restricted by many conditions, and its popularity could not be overestimated. However, the rise of women's education has challenged the prejudice of traditional concepts, improved public morals, and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women's idea on marriage and employment. The rise of women's education also reflected the achievements of westernization reform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In the long run, women's education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w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women's progress and liber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Keywords: Ottoman Empire; Westernization Reform, Women's Education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Jews in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lat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Zhang Bo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Jews in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Islam's policy towards the Dhimmis was the basis of Ottoman Empire's limited tolerance towards the Jews. Although in the Ottoman Empire the status of Jews was lower than the Muslims, the Jews could engage in various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16th century was the Golden age of both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Jews in the Ottoman Empire. The Jews got much tolerance and important positions in the Ottoman Empire. They also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Empire's commercial, trade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Keywords: Ottoman Empire; Jews; Economic Activities; Limited Tolerance